

路遥《平凡的世界》中人性的文化规约

曹静娴*

〔摘要〕《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反映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黄土地民众生活图景的长篇巨著。小说之所以能够受到不同年代、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喜爱,根源在于作者笔下的人物既体现出了他们作为普通的“人”而具有的本性,又体现出了在一定的文化规约下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认知特点。作品所呈现的思想与受这种文化影响下读者的思想处于同一认知层次,因而也就使得作品能够历久弥新。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人性;文化规约

《平凡的世界》是陕西作家路遥用六年时间创作的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为时间背景的长篇小说。小说以陕北青年孙少平和孙少安为主要人物,全景式地描写了在大地上生生不息人们的生活图景。《平凡的世界》从1986年出版至今一直是读者们喜欢的一部著作,它之所以能够得到不同时代、不同年龄段人的认可和思索,关键在于作者首先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一个普通的“人”来描写,具有“人”所固含的本性;同时又把人物置于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之下,路遥认为“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①,因此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是受文化影响的人。正是这种文化的规约下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行为特征,使得小说与读者达到了共同的文化认知层次。“只要读者不抛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②也正是这种共同性,才能使作品历久弥新。

对路遥《平凡的世界》的研究已经有不少,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有以下:1. 对作品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研究。如曾镇南的《现实主义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小说评论》1987年第3期)认为:“《平凡的世界》采用的创作方法,是非常严谨的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的采用取决于作家对他所面对的时代的独特认识和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本来面目的典型理解。还有邵燕君的《〈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畅销书”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认为,“如果说有些作品因吸取了一定的现代文学观念和技巧,获得评论界的较高评价,因而在流通中获得了更多‘象征资本’的支持的话,《平凡的世界》却因恪守传统现实主义风格而受到读者更深切的喜爱”。2. 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研究。如连文斌的《分析路遥〈平凡的世界〉中人物形象》(《语文建设》2014年第24期),戴智辉的《浅析〈平凡的世界〉的人物形象特征》(《世纪桥》2010年第5期)等。

*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250100。

①②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出版,2012年,第25、13页。

3. 研究路遥作品所体现的路遥的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如胡灰杰的《路遥:德性的坚守及其偏至——〈平凡的世界〉为中心》(《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2期)、张喜田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另外还有解读《平凡的世界》的结构艺术、关于《平凡的世界》中的人性美的研究、关于大时代下城乡的变迁的研究以及《平凡的世界》中农民形象的讨论,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挖掘出了作家和作品的价值,不过,《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在广大普通读者心目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①,归根结底在于对作品中所折射的人性的文化规约性,但是对这一点学者们却鲜有研究。

一、关于人性的多维思索

文学作品作为现实世界的艺术化表达,表达的是作者对世界的思索。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从深处去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探究人的原始本性以及在一定的文化教养下的文化人会有什么样的外在体现,人物又是如何在文化或道德的规约下表现自己,而不是只做脸谱化的描写。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有意或者无意都涉及到了人性的问题。在有的作品中,人性是作者主要探讨的问题;在有的作品中,人性是作者探讨其他问题的媒介。如果说生、死、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那么无论是生、死,还是爱,都是对人类自身的探索——在某些特殊时刻更能体现人类的原始本性。

人性是“人的本性;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和理性”^②。人是世界上存在的最复杂的动物,人类创造着现实的人文社会,也被现实的人文社会所改造。在人类自身的身上,既有高尚的一面,又有低下的一面;既有对物质的要求,又有对精神的追求。人类从自我意识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探索自己的属性,本体论者所探究的是人类自身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从希腊神话中“人是什么”的故事到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尼采的“上帝死了”等等探究中,都折射出人类对自身本体的思索。认识讨论的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也就是人类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人类是如何用自身的知识来认识世界的问题。人类之所以与其他动物有区别,最终是因为人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接受了文化的教化,因此就形成了“自然人”、“宗教人”、“文化人”、“智慧人”、“理性人”、“生物人”、“文明人”、“行为入”、“心理人”、“存在人”等等不同属性的人的分类^③。不同的视点透视出“人”的不同属性,从宗教角度上来看,人既有神性(理性)的一面,又有兽性(本能和情感)的一面,任何单纯强调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观点都是不客观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他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文化性、感性、理性等等看似对立的特点。从心理学角度上来看,人有两个本能,即生与死,生的本能表现为善良、慈爱、宽容等积极的行为,死的本能则体现为贪婪、自毁、杀戮等邪恶的行为。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审美需求,这些需求由低至高,基本需求在人的最底层,审美需求在最高层。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这些需求都隐含在自我意识之内,只是越低层次的需求越具有必须性,越高层次的需求越难以达到。这些需求都是人性的内在隐含成分,它们同时存在于人的体内,是人的肉体与精神的统一体。

的确,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既具有人作为动物的属性,又具有经过文化教导过的痕迹,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是这个文化群体在长期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经验的积淀,因此,很难用某一

^①梁向阳:《路遥研究述评》,《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②李行健等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1106页。

^③赵敦华主编:《西方人学观念史》,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年,1—8页。

种理论或者学说来界定人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就人类的最原始的本性而言,生存是第一需求,生存“这一严酷的必要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压抑一部分追求快乐和满足的倾向”^①。但是经过文化教化之后,人就会以某些高于原始本性的精神力量来引导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这个认知群体的共识,以便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在原始本性和文化规约之间,到底是那一面占据了更多的位置,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不同的,因此也就体现出人性的多样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人文学科都希望通过某种媒介来探究“人”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因素影响着人性的发展,在面对某些不同的事件的时候,人又是怎么表现自己的。

二、《平凡的世界》中关于人性的描写

《平凡的世界》描写了孙少平、孙少安、孙玉厚、田润叶、田晓霞、王满银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在小说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孙少平的精神世界。孙少平是一个出身寒门的知识青年,作者将他对物质的态度、对爱的追求、对自我的归属感、对受他人尊重的愿望以及对实现自身价值等各个层面都进行较为详细的描写。

作为一个地道庄稼人的后代,孙少平人性中的基本需求层次只能勉强满足,当更高层次的需求由于物质方面的贫乏而受到影响时,作者用心理描写的方法来体现人物的这种渴求。如在第一部第二章就写到:“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②“自尊心”由于“贫困”这一最低层面上的需求不能满足而受到影响,这对于接受了一些外文化、希望“也遇到一个冬妮娅”的少平而言,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甚至要大于物质需求本身。而且,当他的正常的人性需求受到制约时,他在行为上也体现出某种反抗。如在第一部第二章中写到:“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他看见他站在讲台上,穿戴时髦笔直,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神态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点名的时候,点到谁,谁就答个到。有一次点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没有吭声。”^③他不吭声的原因是他没有得到作为一个人同等的地位和尊重,当这种正常的需求不能达到时,他就会以某种突出自我的方式来凸显自身的存在。除此之外,作者还用人物对未来的梦想来充实人物的形象特征。如在第一部第十八章中写到:“他突然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大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是孙少平在对自己未来受人尊敬、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设想,也是他需要努力的方向。在学校的成长历程中,孙少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他作为“人”的受尊重的需求,他“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而且在他要去黄原演出时,他也“在村里都家喻户晓了”,“似乎他已经成了个人物”。这种被认可、被尊重的感觉使少平感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满足,“尽管他的物质生活仍然没什么改变,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开始丰富起来”,“班上的同学都开始对他尊重起来”^④。作者对孙少平成长历程中的心理和行为

^①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②③}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出版,2013年,第7—8、9页。

^④分别见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129、119、135、117页。

方式的描写,使得孙少平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了人性中的各种的需求。

在小说中的其他人的身上同样有人性中的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但是由于所接受的教育和家庭出身的不同而弱化了一些方面的需求。田晓霞虽然与孙少平在接受新思想方面有共同之处,但是她在基本生活资料方面要比孙少平充裕得多,而且家庭的社会地位决定她所得到的“受尊重”感也是充裕的。因此田晓霞在追求爱和更高的精神方面的需求时的步子就要比孙少平的大得多。而孙玉厚和孙少安等人物虽然与孙少平有同样的生活背景,但是由于他们接受的是黄土地几千年的文化、道德知识,因此他们成为了文化规约的无意识接受者和执行者,其思维方式已经固化在这些规约中,在人性中更多的是文化的痕迹。

三、《平凡的世界》中人性的文化规约

文化规约是在一定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群体在心理、行为等方面所体现的集体规约性。人是一种社会中的动物,人的思想首先来自于祖祖辈辈所传承下来的文化的积淀,这种文化积淀存于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社会群体之中。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无形中接受着这种文化规约,它使这个民族或者社会群体的行为具有某种必然性。如果说人性是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所具有的天然本性,那么在一定的文化规约下,有些本性由于受到了这个文化社群的认可或者赞赏而得到放大;而有些本性则因为遭到了该文化社群的否定或者贬低而受到压制。《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是黄土高原上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所传承的是既有传统的儒家、道家文化,又有黄土地民众几千年的生存经验。“路遥的家乡陕北,是多民族文化的‘杂交’地带,这里不仅有正统的儒家思想,还有散布在民间中的道德伦理”,“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共同铸造了该地区人们特殊的心理气质和性格”,这些特殊的心理气质和性格形成了这个社群的文化思维系统,它隐藏在这个社群内心深处,无形中制约着这个群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在无意识中践行着由祖祖辈辈所传承的这些文化法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儒家、道家和宗族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社会价值体系,儒家思想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规则和道德法则,其中的核心观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社会成员,首先要做的是“修身”,修身也就是自我道德约束的问题,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首先要进行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只有约束了人性中对社会秩序不利的成分,才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人性中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成分就要被割弃,而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发展的因素会被加以褒奖或者放大。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道德自我完善与否既是这个社群的成员潜意识中的自我道德约束,也是这个社会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在小说的第一部中,作者就写到:“玉厚老汉在心里时常为自己的子女而骄傲,孩子们一个个都懂事明理,长的茁茁壮壮的。”^①“懂事明理”也就是说孩子们思想和言行举止都符合这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教养。孙少安作为家中的老大,在上完高小之后就“不用父亲说,自己也知道不能去城里读书了”。他当然也知道不去上学就意味着一辈子要在村里做个“受苦人”,但是,在小学毕业之后,他知道家中的情况,因此“他自己就像一个成熟的大人那样,给润叶说明他为什么不能上学了”^②。少安这种道德得自我完善再加上他的吃苦精神,使他成为了村中的领头人。孙少安的成长历程,正是这个社群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而作者的这一安排,恰恰体现了作者对符合儒家文化的认可。

在儒家思想中,家庭关系是最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家庭能够健康发展需要每一个成员遵守道德

^{①②}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41、80、81页。

和文化规约。在儒家思想的制约下,人性中的需求就向着这种社会规约发展。在《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作为一家之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享什么福,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子女。只要儿女们能活的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心甘情愿”^①。也就是说,对于他而言,他存在的意义就是家庭其他成员的幸福。而且在家庭关系中,“长兄为父”这一思想成为每一个成员践行的道德准则。孙玉厚作为家中的老大,在弟弟孙玉亭娶媳妇后就把自己的窑洞让给弟弟住,自己先借了金波家的一孔窑洞住了几年,后来自己又打了一眼土窑才安下了家;孙少安作为家中的老大,在家中有事的时候,“严酷的现实要求他立刻成为这个家的临时主事人。他已经长大,应该对家里承担起责任来”^②。在小说的第三部中,少安分家之后,少平就承担了长兄的责任,在兰香上大学的时候每月给她生活费。这种家庭中的父父子子、长兄为父等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它使人物在无意识中用这种潜在的文化制约着自己的行为。

宗族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经验,在古代既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宗族共享利益的实践经验,也有“一人有罪,诛连九族”的宗族共担罪责的经验,尽管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了,但是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还是影响着这个社群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存在于每一个成员认知的深层次中。如在小说的第一部作者就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描述:“新社会几十年,尽管农村等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交错复杂的变化,但互族之间的矛盾,平时还模模糊糊存在着。……而且一般说来,两个人身边最亲近的知己,也往往是本族人。”^③这种思想影响着这个社群人们的心理和行事方式,就连孙玉亭对他的哥哥孙玉厚也是,“他哥终究是他哥!别说他说了这么些话,就是再反动一点,他也不会出卖他的。哼,革命是革命,亲人是亲人”。在宗族连带关系的制约下,人性中的社会归属感首先就限定在宗族关系中。贺凤英即使是“穷积极”,但是在对待批斗王满银的这件事上,也“让少平知道她终究也是自家人”。而且为了宗族的利益,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接受着自己亲属的心理引导,不利于本宗族的行为会被加以谴责或制止。王满银虽然对这种文化教养都采取不接纳的态度,但是,在他因为卖老鼠药而受到劳教时,看到孙少平之后,“脸上倒显出几分羞愧的颜色”^④。也就是说这种潜意识存在于每一个成员的内心深处,即使是不愿意接受它,也无法抹去它的存在。

道家思想的核心则是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安逸。在《平凡的世界》中,少安拒绝润叶的原因是他与润叶的生活环境差距太大,他不能给润叶应有的生活,因此,尽管他也知道润叶喜欢他,尽管他也知道如果他和润叶在一起会得到更多的心理上的满足感,但是,文化的规约性使他压抑了自己本性中追求精神满足的需求。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最终以田晓霞的死而结束,这不仅仅是小说中的故事本身,也体现了受中华民族文化影响下的作者的认知态度:精神上的对爱、对美的追求最终都是需要制约在这个文化社群共同认可的社会规则之下,假如没有了社会规则,得不到内心的安逸,终究还是要痛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少平最终选择了惠英嫂做自己的伴侣,精神上的追求最终在文化的制约下回归到了生活的轨迹中。

四、文化规约下人性的扬弃

如果说,人性是人类作为“人”而具有的所有的属性,那么,文化规约就是人类在长期生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它使得在这种文化规约下生活的人们在无意识中都会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在这些文化规约下,人的有些属性由于符合整个社群的集体利益而得到弘扬,而有的属性则由于有损于整个

^{①②③}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33、39、55页。

^④分别见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54、47、46页。

社群的利益而被抑制或者摒弃。这样,人在行事过程中就会尽量符合整体的文化规约,以使自己的行为得到自己所处的群体的认可甚至赞誉,而避免做出与文化规约相悖的事情,以减少自己在这个社群生活的各种阻力。在《平凡的世界》中,所有的人的人性都受到了文化规约的改造。孙玉厚、孙少安等传统文化规约的接受者和执行者不用说,就是孙少平这个接受了新的知识、新思想的人也同样严格遵守着祖辈传承下来的文化规约,将自己正常的人性需求压制在心中,因此在小说中也是以心理描写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作者所赞誉的,也是小说中受到其他人尊重的,正是那些与这个社群的文化认知倾向一致的人;而那些只顾满足自己需求,却置于自己所处的文化群体共同认可的道德规范不一致的,自然会遭到别人的唾弃,因此也就不会真正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王满银作为这个文化群体中文化曾经的背叛者,在人生的后半生,“才认识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过去曾过着什么样的日子”^①,最后回归到了文化规约的范围内。田晓霞虽然是作者所赞扬的人物,但是她更代表的是某种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与黄土地上传统的“门当户对”等观念并不一致,因此她最终只能成为孙少平的精神伴侣。孙少安作为他所处社群中文化规约的发扬者,最终成为这个社群中的领头人物,他的成功使其他通过他的生活经验,就会同样遵守这种文化规约。正是这样,文化规约使得人的人性在无意识中接受了文化的洗礼,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秩序,保障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五、小结

文学作品能够吸引读者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它所描述的世界图景与读者的认知层次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人物作为小说的核心因子,是作者表达思想的主要媒介。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物的典型代表,这些人物首先作为“人”而具有人的共性,但是由于不同的人对文化规约的接受程度、方式不同而又具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如果说人性是每一个人内部隐含的原始本性,那么,文化就给予人的原始本性披上了各种颜色的外衣。在《平凡的世界》中,每一个人物在实现自己人性中的需求时,都在无意识中接受着这个社群所处的文化规约,它使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符合同一文化社群的读者的思维方式,因此也就得到了该文化社群的认可和赞誉,这也是作品能够受到不同的时代、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欢迎的根源。

(责任编辑:陆 林)

Cultural Norms of Humanity in Lu Yao's *Pingfande Shijie*

CAO Jing-xian

Abstract: Lu Yao's *Pingfande shijie* 平凡的世界 (*Ordinary World*) is an opus depicting the life of people living on the Huangtu plateau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 from the mid 1970s to the mid 1980s. The reason why this novel is well accepted by readers of different ages in different times is that the nature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features of their cultural awareness determined by the cultural norms are both best shown by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ovel. The novel gains a timeless quality because its readers feel great affinity with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Key words: *Pingfande shijie*; humanity; cultural norms

^①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76页。